

門外窺金文

香港中文大學 蘇芳淑

中國歷史悠久的金文研究，著重銘文釋讀和內容考釋，已經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學界對西周青銅銘文的一般特色已有相當的共識：通常銘文的基本內容都是記載誰為誰因何事而做器，有的十分簡短，有的則長達數百字；銘文大多寫明作器人的名字、身份、地位；受祭人往往是作器人的祖先；作器的緣由常常是因為受到周王的賞賜等。

這些文字資料是研究西周歷史重要的參考，也是代表祭祀禮儀在周人政治社會的核心地位。同時，有學者提出金文記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銘文內容較單一，只是社會文化某些片面的反應；銘文寫作出於做器人個人的角度；內容格式化對銘文創作的限制；器形也會影響銘文的長短。夏含夷在研究西周金文時曾經提出還需重視銘文未曾記錄的內容。本文即探討西周金文中未見的部份——西周王室銅器今何在？如果說禮器是西周祭祀禮儀的重要道具，並且在已經發現數量眾多貴族做器的情況下，為什麼只有極少西周王室的禮器呢？西周早期一件著名的銅器「利簋」，其銘文記載武王克商後舉行的重要儀式，在該儀式上武王使用的是什麼樣的禮器？

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鹿方鼎、牛方鼎、以及婦好方鼎，從其出土地點和銘文來看，都是與商王室有直接關係的銅器。賽克勒藝術館收藏的一件晚商銅簋，其較長銘文記載畢 *si* 因受到商王的賞賜，而鑄造這件簋來祭祀先祖。因此，貴族鑄器祭祀祖先，並在器物上鑄寫銘文記載事由的傳統始於商晚期。西周在青

銅器鑄銘記事，為貴族大臣因循此傳統，鑄器祭祖。西周晚至東周始，王室衰微，諸侯並起。這時期的青銅器，主要是各國諸侯之器，銘文內容大多寫明為作器人自身的享用所作。例如西邊秦國的秦公鼎、北部晉國的晉侯鼎、南方楚國的王孫誥編鐘以及東方越國的越王勾踐劍等。戰國晚期以至西漢，青銅銘文內容進一步世俗化。例如首陽齋所藏商鞅鉞，記載鑄器時間、監造官員等，主要為官府手工業控制產品質量而採取的措施；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西漢銅鼎銘文內容記載器物儲藏倉庫、重量以及容量，表示銘文在青銅器上的角色大事商業化。

青銅銘文最初時與宗教祭祀、宮廷貴族相關，到後來演變為世俗商業的記載，期間經歷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一段動盪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兩件重要帶銘銅器——「鬲公盨」以及「史牆盤」——銘文內容與其他西周銅器相比，極為特殊，具有強烈的政治宣教色彩，為周王室歌功頌德。迄今所知唯一一件周王之器，其後厲王所做的「猷簋」，體量特大，銘文記載厲王向祖先祈求庇佑幫助鞏固江山之語。此三者連繫起來，很可能在西周中晚期政治動盪、禮制變革時期，周王室為了鞏固統治不得不加強政治宣傳，大勢強調天命和功績。「鬲公盨」和「史牆盤」銘文（前半）以王室代言人的語氣書寫，可能正是在周王授意下鑄造的。首陽齋所藏秦量，記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秦二世時再度肯定，亦是這類政績宣傳銘文的後期補證。

「猷簋」的銘文內容與常見的貴族祭祀禮器相似，「鬲公盨」以及「史牆盤」為周王代言，都與西周王室密切相關。但是，這類銅器只是鳳毛麟角，還不能回答最初的疑問——周王室的禮器在哪裡、是什麼樣？除了對銘文的關注之外，恐怕也不能忽視那些沒有銘文的銅器，它們或能解開這一謎題。